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品读《学记》教育智慧

杨雪翠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杂志社, 北京 102617)

摘要:《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是其总纲,为了保证总纲的顺利实施,《学记》继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管理制度、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并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记》中的“教学为先”、“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善喻”等命题,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学记; 教学相长; 长善救失; 善喻

中图分类号: G4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09)02-0075-07

《学记》是我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一篇,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先秦儒家学派的教育经验和基本理论,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长久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命题,揭示了教育领域内的基本规律。因此,虽然时隔两千多年,直到今天,其中的话语还经常被人们引用作为立论的依据。重温这一经典,必会给予我们思想的启迪和理论的引领。

一、《学记》的作者及其成书

(一)《学记》的作者

《学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礼记》是由汉儒戴圣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所选取的文章,有的出自著名经学家和知名学者,有的是从“子、史”中杂抄得来的,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很是驳杂,各篇的作者是谁很难定论。至于《学记》出自何人之手,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观点是:

1. 该篇为孔门弟子所作。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歿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北宋程颢认为《礼记》虽出于汉儒,但《乐记》、《学记》、《大学》等,仍出于孔门弟子是毋庸置疑的。《学记》为孔门弟子所作,然而孔门弟子甚多,依《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学记》究竟为哪一派

的作品呢?宋代罗璧引梁沈约的话说:“《学记》出毛生。”毛生即毛萇,属子夏氏之儒一派,而子夏只传《诗》未曾传《礼》,故此说不足信。冯友兰认为《学记》中“强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的意思,是“主张性恶之说”。依此为依据,论证《学记》为荀学。郭沫若则认为《学记》为孟学。他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子·离娄下》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完全合拍。他还认为,《大学》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并断定为孟子的高足乐正克所作,而《大学》与《学记》为表里,因此认定《学记》亦为乐正克所作^[1]。

2. 该篇由汉儒董仲舒所作。清代陆奎勋认为《学记》是继《王制》而作,而《王制》是汉文帝时的作品,因此,《学记》也被定为汉时作品。后来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出自汉儒之手。杜通明或许受清代陆奎勋等的影响,认为《学记》为子夏后学汉经师家董仲舒所作。他在《学记考释》里指出,《学记》中的文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对贤良策》中的文体、语句颇多相似之处。如《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此之谓也”,“其此之谓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张,亦往往与《学记》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记》主

收稿日期: 2008-12-27

作者简介: 杨雪翠(1979-),女,山东成武人,教育学硕士,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张“化民成俗”，董仲舒在《对策（三）》中也有“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学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仲舒则在《对策（二）》中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记》中特别强调“继志”、“务本”，董仲舒也有“重志”、“重本”的主张，因之就认定《学记》为董仲舒所作^[2]。

（二）《学记》的成书

至于《学记》的成书年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成于汉代，二是认为成于战国。持前者的理由：其一，《礼记》乃“杂出于汉儒”，内容主要反映“秦汉之礼”，故《学记》也不例外。其二，战国时期教育问题未受重视，《学记》的“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只能是反映汉代太学建立之后对学校教育与教学的要求。其三，《学记》与《中庸》为同时代作品，或作于《中庸》之后，而《中庸》却是秦统一后儒家之作。其四，《学记》乃董仲舒所作。持后者的理由：一是《礼记》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学记》也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按“思、孟、乐正氏皆出曾门”之论，即子思学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乐正克学于孟子。至乐正克时，已到战国晚期。二是《学记》中的“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揭示了“君”与“师”的对等关系，从而对君臣间的尊卑关系作些修正。与此相反，汉代董仲舒以“君权神授”将尊君抑臣理论化，授予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故认为《学记》成于汉代，或认为董仲舒所作，于理不通。三是《学记》中的“始驾者反之，车在马前”，先秦养马，主要用以驾车。战国后期，除赵国有单骑，马用以驾车仍是普遍现象。后此关于骑马的记载，则见于秦末汉初。秦汉之际，驯马主要为便于骑，非便于驾。则“始驾者反之，车在马前”，只能是战国时期的特定语言^[3]。

由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及成书年代，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获得一个为学术界所满意的定论。本文认为对于《学记》作者的认定应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由于《礼记》多数篇章源于思孟学派，因此，《学记》应是思孟学派的著作，也不排除乐正克所作的可能性。关于《学记》的成书，本文认为《学记》成书于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各家在相互诘难的同时，也在相互渗透。因此，思孟学派

在较长时间的传习过程中，在继承前辈和荀子的思想的同时，也吸取了同时代各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精髓，详细总结有关教育理论，逐步系统化、完整化，是时已基本谋篇成书，定其格局。如《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当取自《墨子》“君子如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逮“秦火”之后，《学记》或有损失。继而又经汉儒在传经和编辑《礼记》过程中逐步充实，加入了汉代的思想内容，如三引《说命》之说作为某个问题的结论性的论说，就是最好的说明。逮《小戴礼记》定格后，《学记》也就定型成为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种面貌，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从哲学分离出来，体系十分完整而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4]。

二、《学记》中的教育建构

《学记》通篇以名言隽语构建而成，全文仅1229个字，篇幅虽短，但简约达练，字字珠玑，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学记》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为总纲，以一套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为组织基础，以一套相互衔接的学年制度和严格的学生考核标准为制度保障，以“教学相长”等为代表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为方法论支持，以“善教”之师为人力支持，建构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

（一）“建国”与“化民”：“教学为先”的双重作用

《学记》前两段以格言化的语言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论证了教育的作用。它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里的“教学”等同于教育。《学记》认为教育的作用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1. “建国君民”：教育与社会建构。教育的社会功能，为历代教育思想家所肯定。《学记》对先秦儒家的这一思想，做出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并开宗明义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发虑宪，求善良”、“就贤体远”与“学”是三种层次不同的教化政策，“谏闻”、“动众”与“化民”是三种层次不同的教化效果。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学”是最好的教化政策。

“化民”是最好的教化效果。因此，“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具有育人才、一道德、正人心、美风俗的功能，对于治国安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段话明显地揭示了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带有本质性的理论问题。

2 “化民成俗”：教育与个人建构。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由所培养的人来完成。《学记》以“琢玉成器”为喻引申出“人不学，不知道”，揭示了经过“雕琢”人能“成器”的教育的可能性，以及只有通过教育人才能“知道”的教育的必要性。“人不学，不知道。”教育具有使人明晓道理的作用，人必须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成人成才，这就论述了教育对于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 学制与管理：实施“教学为先”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在确定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治国政策之后，要落实此既定政策，在考虑教什么、怎么教之前，首先要解决教育的空间，即机构问题。由此，《学记》设想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建制办学的学制体系，为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另外，《学记》还制定了一套相互衔接的学年制度和严格的学生考核标准，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教育目的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我国传统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开启了端绪。

1. “塾一庠一序一学”：学制体系。《学记》本着儒家德治精神，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基于此，设想了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建制办学，“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代二十五户为一家，五百户为一党，两千五百户为一术，是地方各级行政单位；塾、庠、序、学都是古代学校名称。《学记》主张从“家”到诸侯国分别设立不同级别的学校，构成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实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职能。这个设想渊源于古代学校制度的传说，也成为后代政府进行重大教育改革和规划的蓝图。

2 “小成”—“大成”：学年制度。《学记》将学年设想为两段、五级、九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入学第一年为明

确心意，立定志向，读书能习字断句，明章成篇。第三年要做到专心学业，与人和睦相处。第五年要求知识面宽广，同老师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第七年要求具备独立的见解和选贤能为友的能力。达到上述要求的，即达到“小成”。第二阶段再学两年，即“九年”高级阶段，要求于所学必须触类旁通，闻一知十，意志坚定，不失师悔，可谓“大成”。这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的九年制大学学制，由此可见古代年级制的萌芽。《学记》厘定的学年制度是我国教育史上之首创，标志着教学从随意的松散的状态转而更有计划地更有目的地进行教学，具有巨大的突破性和开创性。

3 “中年考校”：考核制度。教育评价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导向功能，《学记》确立了一套古朴的、完整的考核标准，并使之形成了一种制度，这就使学生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有助于其保持稳定的学习心态。首先，考核时间固定。《学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头年进校，第二年就要考核，以后隔年考核一次。其次，考核内容全面。“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和“强立而不反”等属于德育范畴，“离经”、“博习”、“论学”和“知类通达”等，则属于智育范畴，体现了德智并重的思想。再次，考核程序合理。考核标准是根据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前后连贯、各得其分的精神而规定的，对不同学年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

(三) 教学原则与方法：实施“教学为先”的方法论支持

“人不学，不知道”，“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道”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教学是传“道”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基于此，《学记》又从教学的方法论上论述了如何传“道”的问题，提出了“教学相长”、“豫时孙摩”、“长善救失”等重要的教学原则和“喻”、“善问”等重要的教学方法，为落实“教学为先”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事实上，《学记》历来被认为是系统全面论述教学法的著作，古今学者多是从教学论的角度给予《学记》肯定性的评价。朱熹说：“此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业之序与其得失兴废之由”；清代学者陈澧说：“后世教士以此为法”，“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5]172}。概括起来，《学记》论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主要如下：

1. “教学相长”。教学相长是《学记》在教育史上首先提出的重要教学思想，可视为《学记》论

教与学的总纲。“教学相长”这一命题,揭示了教学过程的本质,即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构成的双边活动。《学记》中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和学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教离不开学,学也离不开教,“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提高。教与学的对立统一,形成教学的全过程。揭示这条规律,是《学记》对教育学的重大贡献。

2 “兴”与“废”。《学记》在论“大学之法”时,总结出了四项“教之所由兴”的教学原则——“豫、时、孙、摩”。“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豫”,即预防性原则,要求教师在施教之前,要及时采取措施,争取将不良之事“禁于未发”之前。“时”,即及时性原则,要求教师抓住适当的教育时机,及时施教。“孙”,即不越级,要求教师以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为依据,按照由浅入深的、由简到繁的基本规律,进行施教。“摩”,即集体性原则,强调同学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豫、时、孙、摩”,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必须遵循的基本依据,是教育取得成功的因素。

《学记》不仅总结了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总结了六条“教之所由废”的教训,以警示教育工作者。《学记》记曰:“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学而不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如果有了不良的行为才去禁止,就不容易矫正过往;如果错过了求学时机,学习就不容易取得成就;如果教材杂乱无章,不注意循序渐进,教学就不容易收到效果;如果关起门来学习,缺乏同学辅助,知识就不容易得到增长;如果平时安于同表现不好的同学结伴为非,就会违背师教;如果安于同那些同学搞不正当的事,则会荒嬉学业。这六点都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因素。

3 “长善救失”。《学记》概括总结了致使学生学习失败的四类型的原因:“人之学者也,或失之则多,或失之则寡,或失之则易,或失之则止。”一是好高骛远、贪多务得、急于求成;二是知

识面容,所学过于初褊狭;三是拈轻怕重、专拣容易,难有造诣;四是意志薄弱、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值得称道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学者就从心理学的角度认识到“教学四失”的原因,即“心之莫同也”。《学记》接着说:“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师只有对每一个学生“知其心”,了解到学生的短处,才能有的放矢地去矫正这些缺点,做到“长善救失”。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心理思想。

4 “藏息相辅”。《学记》并不提倡穷经皓首、悬梁刺股的愚勤式的学习方法,而是主张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提出了“藏息相辅”的原则,谓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认为课外活动是课内学习的延伸和补充,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于课外的“退息”,《学记》并没有主张单一消极“休息”,而是提倡开展有益的游艺活动,进行积极“休息”,所以《学记》还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在上课时全神贯注,认真学习;在休息的时候则身心放松,尽情游乐。《学记》所提出的“时教”与“退息”、“藏修”与“息游”相统一的教学原则,虽然很简单,但它却抓住了人生理机制的紧张与疲倦和心理活动的兴奋与抑制等基本特点,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至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 “善喻”与“善问”。《学记》对一些教学方法也有精当的阐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有经验有修养的教师,总是善于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那就是:给学生指引一条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自己前进,而不是硬牵着他们走;激励他们,但不强制使之顺从;给予学生适当的点拨,但是不能和盘托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道而弗牵”,学生才会乐于受教,教与学之间,师与生之间的关系才会和睦友善;“强而弗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才能很好发挥,即使有困难也易于克服;“开而弗达”,学生才能独立思考,培养其思维能力。做到了“和、易以思”,才叫做“善喻”。

此外,《学记》以“攻坚木”,“撞钟”作喻,从善问与善答两个方面来论述了问答教学法。“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

然后尽其声。”善于发问的教师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到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就像砍硬木一样,先砍容易砍的地方,后砍有关节的地方。而善于解答学生问题的教师,则要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给予深度适当的答案,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如同撞钟一样,敲得轻些声音就小,敲得重些声响就大,利用其悠扬不绝的音波,反复吟味,以尽其绪。教师如不遵守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的结果。这些提问和问答的原则仍是今天教学实践中十分宝贵的参考。

(四)“博喻”之师:实施“教学为先”的人力支持

“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必须依靠教学去实施,而教学必须依靠教师去完成。事实上,对教师职业的论述贯穿了《学记》的始终,其对教师的社会地位、作用及素质要求都做出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为实施“教学为先”的治国方略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持。

1. 慎于择师。学校教育成功的关键是拥有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学记》提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此处把为师、为长、为君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使为师实际成为为君的一种素质,这说明了,教师本身也在学习和教人如何统治人民、治理国家,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选拔教师时不能不格外郑重其事。

2. 师严道尊。教师是道的化身,发展教育事业,达到“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关键在于尊师。《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营造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学记》不仅提出尊敬教师,还强调给教师以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则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即使是帝王对教师也要尊重三分,以宾主之礼待之。《学记》把尊重教师,重视教育视为“务本”。“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在这里,作者通过一系列类比形象地说明了教师对于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学记》中的“师严”和“道尊”的观念是我们今天

所讲的“师道尊严”这一伦理概念的滥觞,体现了古代对教育的尊重,对教师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

3. 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教育是治国之本,教师是治教之本。教师地位之高,与君并行;作用之大,关系到治国平天下。因此,《学记》对教师自身素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在理论水平方面,要求教师懂得教育理论,掌握教育规律。“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学记》还要求教师注意学者容易失误的四个方面,即失之“多、寡、易、止”,然后有的放矢地去施教,做到真正的“长善救失”,从而实现“使人由诚”、“教人尽材”的教学目的。再次,在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方面,要求“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教师既要从教学的实际出发,掌握教学入道的难易,又要辨析学生资质品德的美恶,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去多方面地启发学生,因材施教。只有做到这些,才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教师。教师在启发诱导学生时,要讲究语言艺术,“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具有渊博的知识是教师进行“博喻”的前提,因此,《学记》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又提出了要求,严正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即要求教师有精深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

三、《学记》的现代启示

(一)“教学为先”: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重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命题。孔、孟、荀等儒家大师都反复论证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整顿风俗,使社会秩序和谐,国家长治久安。《学记》开宗明义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是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高度理论概括,揭示了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带有本质性的理论问题,是《学记》的总纲。《学记》的最后一段“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再次提出要以教育为本,与开头首尾呼应,确立了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因此,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因此,要高度重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

(二)“善喻”:倡导启发式教学,实施素质教育

《学记》主张教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把握住学生的心理特点,采用“喻”的启发式教学,这在教学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启发式教学方法在我国,首先是孔子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十分明确地表述了启发式教学的要点。孔子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孟轲所继承和发展,如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学记》对启发式教学作了最完善的发挥,主张教学中不仅要“喻”,还必须“善喻”,强调“弗牵”、“弗抑”、“弗达”,相信学生具有自觉主动的意志表现和独立思考的创造能力,实现了教学过程合规律、合目的、合人性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学记》中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要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必须深化教学改革,改变单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实施启发式教学,使学生积极思考、自觉学习、自求自得,提高他们的思维 and 创新能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复强调要采用启发式教学,他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主张弘扬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思想,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避免灌输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6][141]}。

(三)“博喻”之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学记》历来不仅被认为是系统全面论述教学法的著作,而且也是一部系统全面论述如何为人师、如何为良师的著作。梁启超说:“《学记》一篇,乃专标诲人之术,以告天下之为人师者。”近

人王树楠认为《学记》是“讲求师范者必要之书也”^{[5][173]}。《学记》从日常的教育实践经验中把握了教师职业的各种特征和性质,其对教师职业的论述,对于当前的教师队伍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实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的有力支撑。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素质。首先,要坚持标准,“慎于择师”。在选聘教师时,要依据教师专业标准,严格教师聘用条件,坚持德智并举的考察制度,在第一时间把不合格的人选拒之门外,把那些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开拓创新能力强的人吸纳到教师队伍中来。其次,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教师素养。一方面教师要向教学实践学习,边教边学、以学促教、教学相长,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教师及时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行为,从而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再次,要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尊重教师是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发挥教师工作热情的前提。在我国,尊师重教已逐渐由政策、舆论发展为立法保障。随着《教师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和实施,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尚进一步得到强化,为教师队伍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6][170]}。另外,教师自身也要自尊自励、自警自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人师表,以人民教师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树立起威信,从而成为青少年效仿的榜样和社会道德的楷模,赢得全社会的尊重。

《学记》荟萃了先秦时期教育实践经验之精华,闪耀着古代学者教育智慧之灵光。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回首这一经典论述,科学地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不仅能使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宝藏重放异彩,而且也能给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注入新鲜的思想营养,从而更好地指导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实践。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